

劳动与价值的耦合机制：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伦理分野

林福山

(玉林师范学院, 广西 玉林 537000)

摘要: 资本主义商业化大生产遵循高度的经济理性,片面追求剩余价值导致劳动与价值的关系出现脱节,如何重构两者的关系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出现分歧。亚当·斯密确立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但不理解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体。马克思首先将劳动解构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从而为重建劳动与价值的闭合关系提供了理论可能性,进而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自由才是劳动与价值统一的目标。

关键词: 劳动; 价值; 马克思

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里,个体的劳动实践是以生产要素的方式体现的,个体的劳动和商品生产之间还有资本的参与,现代商品生产是以资本为中介来进行的。在手工作坊的时代,资本还只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死劳动,但在现代化生产体系里,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体性,成为控制商品生产的核心。马克思承认现代性的进步,他没有全盘否定现代性,相反他要求深度改革现代性,要求在政治领域里进行生产资料的属性进行变革。他认为只有在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人民性和政党的先进性的总体理性建构的框架内,商品工业化大生产才能有效消除以逐利为目的的价值体系的负面因子朝向整体和谐的方向发展。

一、劳动与价值的脱节：资本主导下商品生产的伦理后果

价值问题是任何时代的人都必然会遭遇的问题,它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古人对价值问题早就有研究,但还谈不上价值论的形成,原因在于他们的研究只留下了一些只言片语,还没有对价值一般进行自觉辨析和系统考察。在古代,基于认识的局限,人们将劳动与价值的关系神化,把农作物的收成、渔猎的成败和生活的祸福都看作是超自然的神力的结果。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启蒙,人们开始从劳动与价值的耦合关系对现实生活中农作物的收成、渔猎的成败和生活的祸福进行理性分析。

劳动是一个和价值紧密相关的概念。价值索求必须经过相应的劳动过程,人的劳动又必然以价值满足为目的。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实现自我提升,意识到自身与劳动对象的区别,意识到自身劳动与劳动目的也就是价值的区别。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实践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有用还是无用的价值关系。人类有意识的劳动,种类繁多,在价值意义上则以有用与无用的、有益的与有害的、好的与坏的价值规范来进行分类。能够运用意识进行价值判断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由,在本质上是运用价值原则进行的价值抉择,选择对自身价值大的对象是一种必然。人们进行价值的评估权衡,然后通过意向性的劳动,并最终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价值。

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中劳动者是作为生产要素存在的,劳动者独自享有全劳动生产物的原始状态,一旦有了资本蓄积就宣告结束了。劳动过程是以资本化多重生产要素有机结合为前提条件的,其最大特点是分工,分工是生产效率的要求。“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良,以及在任何处指导劳动

或应用劳动时所用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都是分工的结果。”劳动者和劳动结果没有直接性的联系,不能像采摘野果一样摘下来就归自己所有,商品大生产体系中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和劳动者本人没有直接相关性。劳动的客观性与劳动者的主体性价值索求之间失去了一对一的天然联系,洛克所言的劳动直接导致劳动产品的所有权的链条在此断裂了。

在近代,私人财产才与社会公益事业正式脱离关系,财产所有权概念变成一个与公共事业相对立的狭隘概念。“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私人所有权的概念无限上升,必然吞噬社会公共利益的空间,原先在封建社会由封建主维持的社会公共秩序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个无人关心的东西。亚当·斯密认为在无形的推动下资本和工人能够自动合理分享商品生产的价值,黑格尔也在哲学理论上论证了无数个私人活动可以自动遵循最终的公共利益,但是在现实中,社会正义却在一个接一个的经济危机中流产,无论如何也没有呈现出亚当·斯密和黑格尔所论证的那样一个自适状态。人的解放在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只是一个形式,而没能获得现实性。

二、劳动与价值的散合关系：现代商品生产伦理的解构

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不论是谁,只要自己的收入,出自自己的资源,他的收入,就一定出自这三个源泉:劳动、资本或土地。”劳动者的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这三者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目的,而他还特别说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当地的食物等生存必需品的价格相关。生产者的价值和劳动产品的价值之间是一对三的关系,而不是一对一关系。资本要求尽最大可能性增殖,这必然尽可能地压缩其余二者的利益,特别是劳动者的利益。

“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体现人自我生存方式的一种表现,而亚当·斯密认为人要获取的是占有劳动成果后的一种安逸状态。前者谋取的是劳动本身,而后者则要以占有他的劳动成果为目的。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是劳动者即是劳动的从业者又是劳动成果的享受者,而亚当·斯密则将劳动的主体与价值的主体分隔开来,这确实是

当时社会的现实状态，但不幸的是亚当·斯密认为这样一种状态是永恒的，马克思则认为这样一种社会是不合理的，同时也是阶段性的，它终将理想的为理想的社会所代替。

人则可以自由地面对产品，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一个正义社会的现实自由是在全体成员中能够公平合理分配劳动产品。如果启蒙运动的宗教批判是前提，那么，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就是中介，人的解放才是最终的目的。神本主义退场后，人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解放，而是在资本的引导下形成日益加剧的异化，形成以金钱为核心的拜物教，最终导致虚无主义。异化和拜物行为都是资本主义历史时期所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是理性的技术建构和统治的必然结果，一旦人们能够理性建构人与社会的关系，则有可能通过制度建构解决劳动与价值的脱节最终走出现代性困境，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但是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绕过了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和产业工人之间的价值分歧，认为他们在“无形之手”的推动下能够自动调适的。理性与欲望作为现代性内在冲突，这个现代性困境在亚当·斯密那里没能得到真正的克服。他把国家建构价值体系的费用分解为国防费、司法费、公共设施建设费、教育费和执政者养尊处优费，实际上他是在表征一个不合理的世界而不是试图改变这个不合理的世界。

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劳动与价值闭合关系的重建之路

劳动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一种劳动产品必然是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的统一体，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的物质承载者，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两者不可由同一主体兼得。“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马克思特别强调，以往的经济学家没能说明清楚商品生产中劳动的二重性质，“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生产商品的劳动应该识别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不同，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生产交换价值。单从交换价值的角度来说，劳动者是交换价值唯一生产者，应该和产品的价值建立起一对一的关系。交换价值里包括生产资料转移的一部分价值和工人的工资以及由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后两者都是由产业工人劳动所产生的价值增殖。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里，劳动与价值是一对多的散合关系，但劳动者之所以降低到和资本、土地一样成为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是工人没有生产资料的原因，“如果工人能使他的劳动独立存在，他出卖的就是商品，而不是劳动。”

人作为高级动物的生成过程同人的劳动方式是分不开的。自由是劳动的结果，但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不会必然带来价值。价值作为一个高阶的生存方式，它不可以通过先验的证明来获得，而是和人的现实劳动方式和社会的发展状态相联系的。“不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事”价值目的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遵循自然和人自身规律为前提，通过劳动改造外在

的自然为我所用。劳动具有双重特性，具体现实性和计划性或目的性。具体现实性表明劳动引起物体运动的客体运动，生产出来的是商品使用价值，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计划性或目的性表明劳动也是人类有目的的主体行动，他要按照人的价值目标来进行，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关系。因此，要改变劳动者与价值散合关系。就要在社会制度层面去重构，只有建构起劳动与价值的一对一的关系，才能使得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但在时间空间等物理层面统一起来，也能在社会关系层面上统一起来。一句话，人要成为人劳动的终极价值目标，而不能当作其他人不劳而获的工具。

在自然层面而言，人作为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人只有现实地进行劳动，作为自身达到目的的手段，才能完成人是目的的终极目标，一句话，从劳动与价值的关系来说，人应该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人作为手段与人作为目的发生分裂，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是社会制度。资本与生俱来的寄生性与掠夺性，从根本上证伪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一些人之所以只是以手段或者工具存在，相反另一些人作为目的的存在，寄生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的分歧不可能得到和解。这种不合理的现实存在，绝不是仅仅意识到人应该成为目的就能解决的，问题还在于如何改造我们的社会。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质最终决定了人成为所是的那个样子。只有在现实中消灭了不合理的分工形式，才能消除人不成其为人的现象，重建劳动与价值的闭合路径。同时也在理论上证明，狭隘的自利动机片面的逐利行为使得劳动与价值脱节，它必然导致寄生性资本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四、结论

只有反思劳动与价值之间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是如何错位的，又要在何种制度重构下才能统一起来，劳动与劳动价值才能重新勾连起来。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私有化的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与工人阶级追求劳动与劳动成果的一体化，体现的是现代性欲望与理性的二律背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丧失了主体性，沦为生产的要素或者销售的对象，劳动者只在特殊规定性上成为商业生产流通的一个工具，成为片面的人。人要获得全面的发展，就必须建构全新的制度保障体系，使得劳动成为生产出全面的人的一个过程。

参考文献：

- [1] 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译. 国富论（上）[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 [3] 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译. 国富论（下）[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林福山（1973-），男，福建上杭人，哲学博士，讲师，玉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